

第七章

公開的、多元化社會

一、從單一性社會轉向多元化社會

活在十九世紀的馬克斯，親眼目睹歐洲勞動群眾的生活經驗，是勞動、勞動、再勞動，為一日三餐與一張床而艱苦求生。而馬克斯本人則是過著寄生的生活，倚靠資本家的救濟，在圖書館裡努力著述革命性的經濟理論。雖然兒女因營養不良而夭折，雖然偶爾也會偷情，基本上是過著潦倒落魄的生活。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俄國革命家，大多在放逐、逃亡、造反的旅途中捱過有死無生的日子；一旦革命成功，也沒享受幾天好日子。列寧死在病榻上，托洛茨基死於史達林派出的刺客利斧下。許許多多的同志被偉大的領袖史達林整得雞飛狗跳，心驚膽戰，大多進入枉死城。在這種歷史經驗和教訓下，出爐的社會主義社會理論和社會生活問題顯然如同史達林早年在東正教神學院的神學教條。是單純的、一元的生活實際與社會觀點；是和尙、尼姑、神父、修女的生活方式。當然，數十年來蘇共當局對社會的要求始終不變；也讓外國訪客蒞臨俄境後體驗了「清教徒」的生活。甚至讓我國的一些觀光客感覺到，那裡的生活好像是成功嶺，好像是新生活運動。

蘇聯的社會學學者稟承馬列遺訓，認為：(1)在社會經濟領域，應保證大大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強化勞動創造力，不斷提升人民福祉；(2)在社會政治領域內，全力縮短社會群眾與社會階層的差異，形成單一性（統一的）社會，發展社會主義民主；(3)在民族關係領域，應全

力鞏固大小民族的一致（統一）與友好，加深社會的國際化；(4)在精神生活領域內，應使社會所有成員形成科學的世界觀，提高其教育、文化、技術水準，每個人養成共產主義的思想道德品質；(5)在生活領域，應改善勞動者物質與精神需求的一切公共制度，改進勞動者休閒、保健、娛樂的組織。這些社會目標和任務，乍看之下，很像大工廠或軍營的生活要求。

簡單的說，蘇聯的社會應當是：(1)由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組成的，沒有階級對立，祇有階層稍異的社會；(2)城市與鄉村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異逐漸縮短；(3)消除各民族之間的差異，建立國際化的社會；而人民因思想道德教育，賦新的世界觀，具有科學的、無神的、共產主義前瞻觀點的「蘇維埃人」。

當然，有真知卓見和良心的學者，像法謝耶夫 (M. F. Fasseev)、伊祖特金 (A. M. Izutkin) 等人，認為在蘇聯社會主義生活方式同時，應容許存在「民族的生活方式」。卻遭到嚴厲批判。庫利契柯 (M. I. Kulichenko) 即為典型的教條學者兼打手，庫某堅稱在蘇聯「每一個民族沒有任何自主獨立的『民族生活方式』，祇有統一的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生活方式，表現於與各民族歷史特性的結合」。而且國際主義具體表現了比階級的、民族本質更高的社會聯繫水平——亦即「蘇維埃人」是新的歷史的本質。

在這樣封閉、教條的環境下，少數民族的處境自然不會很愉快；甚至是全蘇聯勞動人民也不會覺得舒服。俗語說，一樣米養百樣人，不是人人都會欣賞「悲愴交響曲」；也不是每個人都不相信上帝，更不是所有男人都是柳下惠，所有的女人都喜歡餵奶、換尿布。

戈巴契夫有意打破社會的閉鎖，解除束縛人民心靈和行爲的緊箍咒，希望能激發人民自發的精神，積極主動參與經濟與政治改革。因此，提倡社會的多元化、賦予民族自決權，主張事事公開，以建立民主化的多元社會。其作爲明顯表現在：(1)放棄鉗制社會輿論，准許百家爭鳴，思想無罪。(2)放棄共黨一黨專政，准許多黨化，社會上出現各型各類的社會性、政治性團體和運動。(3)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和傳統習慣，准許民族自治。(4)尊重人權，同意以國際公認的人權爲蘇聯人權準則。不再持守專門用來監禁思想犯、政治犯的「社會主義人權」標準。

不過，戈巴契夫的公開性、多元性、民主化社會主義社會正面臨嚴重的經濟、政治、民族危機和動亂。社會多元化夾雜著民族糾紛，使大一統天下瀕臨分裂關頭。

二、人口、民族、宗教

蘇聯總人口現約二億九千萬，一九八九年元月總普查時總數爲二億八千六百七十三萬一千元（包括臨時居住外國人九十八萬八千人），其中男性人口一億三千五百三十六萬一千元，占四七·二%；女性人口一億五千一百卅七萬人，占五二·八%。總人口當中，城居人口占六五·九%，鄉居人口占三四·一%。都市化程度在已開發國家而論，並不很高。

未滿十六歲以下人口共七千七百九十萬五千人，具勞動力人口（男性十六歲至五九歲，

女性十六歲至五四歲)共一億五千八百九十一萬一千人,老年人口四千八百八十一萬八千人。老年人口當中,七十歲至七九歲人數爲一千二百廿九萬九千人,八十歲以上人數爲四百九十八萬九千人。一九八八年平均壽命爲六九·五歲,其中男性六四·八歲,女性七三·六歲。未滿一歲嬰孩死亡率爲千分之二四·七,比一九八七年的千分之二五·四略減,但比美國、日本、英、法、西德的夭折率要高一·四倍—四倍。

人口出生率在一九八八年爲千分之一八·八,死亡率千分之一〇·一,自然增加率爲千分之八·七。各地區人口自然增加率不一,像烏克蘭共和國祇有千分之二·八,俄羅斯共和國千分之五·三,立陶宛千分之二·三;但在落後地區,烏茲別克千分之二八·三,塔吉克千分之三三,土庫曼千分之二八·二,增加率相當高。

蘇聯是地大、人多、種雜,境內各大小民族、部族數目超過一百多種;按語言分約一三〇種不同語言,分別屬於斯拉夫、波羅特、拉丁、波斯、亞美尼亞、日耳曼等語系。有七十八個民族、部族擁有書寫文字,其中五十多個是在俄共政權成立後按照俄文字母拼音編成的。

一九八九年人口總普查,人口總數二億八千五百七十四萬二千人(不含外國籍居民)。其中:俄羅斯人一億四千五百一十五萬五千人,佔總人口的五〇·八%;烏克蘭人四千四百一十八萬六千人,佔一五·五%;白俄羅斯人一千零三萬六千人,佔三·五%;上述三族屬斯拉夫人,合佔蘇聯人口總數的六九·八%。回教民衆:烏茲別克人一千六百六十九萬八千人,哈薩克人八百一十三萬六千人,阿塞拜疆人六百七十七萬人,韃靼人六百六十四萬九千人,

塔吉克人四百廿一萬五千人，土庫曼人二百七十二萬九千人，吉爾吉斯人二百五十二萬九千人；七族總共四千七百七十二萬六千人，佔蘇聯總人口數的一五·七%。波羅的海民族；立陶宛人三百零六萬七千人，拉脫維亞人一百四十五萬九千人，愛沙尼亞人一百零二萬七千人；三族共計五百五十五萬三千人，佔總人口的一·九%。亞美尼亞人四百六十二萬三千人，摩爾達維亞人三百三十二萬五千人，喬治亞人三百九十八萬一萬人；這三族與波羅的海民族都在鬧獨立運動。其他人數較多的少數民族是：日耳曼人二百零三萬八千人，楚瓦什人一百八十四萬二千人，巴什基耳人一百四十四萬九千人，猶太人一百卅七萬八千人，莫耳多瓦人一百一十五萬四千人，波蘭人一百一十二萬六千人。其餘少數民族、部族人數均不滿百萬人，有的祇有十數萬，甚至數千人。一些東方民族值得提述：朝鮮人四十三萬八千人，布梁特人四十二萬一萬人，雅庫特人三十八萬二千人，土文人（唐努烏梁海）二十萬七千人，中國人（漢族）一萬一千三百五十五人。

俄羅斯語言是官方語言，普查顯示，以俄語為母語的人數一億六千三百五十七萬八千人，其中包括非俄羅斯人一千八百七十四萬三千人。另外，自認通曉俄語的人數六千八百七十九萬人。總計，俄語人口佔總人口的八一·三%。比一九七九年普查的八一·九%減少了〇·六%，但比一九七〇年的七六%，一九五九年的七一%有所增加。事實證明，蘇聯約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不懂俄語，大概是以老年人和未上學的少數民族為主。一般說來，都市地區俄語較普遍，鄉村地區多以本族語言為日常用語，特別是波羅的海、高加索、中亞等地區較顯著。

移民問題過去一向是禁忌，除了極少數出名的異議分子享受「出國」（被剝奪公民權、驅逐出境）的待遇外；如果提出移民申請，動輒被視作反政府的問題人物。唯一移民人數最多的民族是猶太人，在一九六八年十月至一九八五年共有廿六萬五千名猶太人離開蘇聯。日耳曼人亦有少數移民西德。這都與蘇聯和美國、西德關係變化有關，此外就是亞美尼亞人外移較多。戈巴契夫執政後，對外政策大變，亦不禁止移民。一九八七年移民國外者約四萬人，一九八八年超過十萬人。一九九〇年一至七月共簽發二十三萬四千份移民許可證，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一·二倍，申請往以色列的有十三萬二千人，往西德的七萬三千四百人，往希臘的一萬六千八百人，往美國的五千三百人。猶太人移民之衆多與俄羅斯人相互憎恨有關。蘇聯現政策若持續不變，猶太人可能會走得精光，而「屋頂上的提琴手」將成歷史絕響。

宗教信仰一直是馬列主義的天仇，亦是共黨執政當局頭痛問題。而且宗教亦是各民族團結本族的精神力量。據估計，蘇聯境內約有四十種宗教和教派。一般說來，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多信奉東正教（與希臘正教同源），波羅的海地區（特別是立陶宛人）、摩爾達維亞人、白俄羅斯人、烏克蘭西部地區民衆和部分日耳曼人、波蘭人多屬天主教徒。猶太人屬於猶太教徒。中亞地區的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塔吉克人、土庫曼人和吉爾吉斯人，以及外高加索的阿塞拜疆人，克里米亞地區的韃靼人、巴什基里亞人多屬於回教徒。亞美尼亞人信奉古基督教（使徒教派）。在東部西伯利亞和俄屬遠東的土著多信奉喇嘛教。基督教（新教）各教派散見於歐俄地區。

關於宗教教徒人數甚難估計，粗略的說法就是把民族人數當作信徒人數。比較保守、不完整的估計是：佛教徒約五萬人，回教徒約四千萬人，猶太教一百八十萬（現可能更少），東正教四千萬（估計過少），天主教三百五十萬人，路德教派八十五萬人，福音浸禮教派約三百萬人，東正教舊教派約五萬人。由於缺少官方統計，而且信徒亦多不公開其信仰，這種統計祇具參考價值。

在共黨政權下迫害宗教乃是常態。往昔東正教教堂大多被毀，沒毀的改作博物館或其他用途；教士則被勞改。二次大戰期間，史達林爲了拯救危機，准許東正教恢復有限活動，利用宗教信仰發揮愛國精神。八〇年代之前普遍現象是：教會、教堂奇缺，教士神甫無影蹤（全國教士屈指可數），信徒多是老年人（來日無多，再不上教堂死後上不了天堂）。此外，「地下教會」秘密傳教倒是時有所聞。當然，當局御用的宗教團體還時常與外國教會聯繫，保持自由信仰的形象。

今年九月，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通過立法，放寬宗教活動限制。重申政教分離原則。法律強調政治領袖不可以干涉宗教活動，政府既不會資助教會，亦不會資助「無神論」宣傳。法律亦批准政府繼續歸還教堂。戈巴契夫早在一九八八年四月底與東正教宗主教會晤時，就已承認共黨執政對宗教自由所犯的錯誤。儘管如此，宗教信仰問題在個別地方仍然遭到保守派的阻擾。例如，東正教要求歸還十一世紀建成的基輔山洞修道院，即遭到烏克蘭共黨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反對；後經戈巴契夫出面，教會保證自費修護修道院及願將之作爲基輔市公

產，才獲得解決。

宗教信仰重獲自由，並可公開活動和舉行儀式，無疑是共黨政權成立後七十年來的大事，大逆轉。當然，戈巴契夫亦想利用宗教來安定人心，重建日益敗壞的社會道德和風氣。「信神的人民不會變壞」，這應該可作為戈巴契夫說服保守派的最佳理由罷！

三、經濟生活與社會福利

按照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求而論，在正常情況下，蘇聯人民的生活還不至於飢寒無依。首先必需歸功於傳統的家族制度，其次是社會福利措施。但是若要求精緻的生活品質和稍微豐裕的消費供應，則不是人人能享有的。

舊的計畫經濟制度下，強調「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不過爲了維持完全就業景象，也造成冗員充斥、效率低落的弊病。無論如何，這種充分保障的時代逐漸消逝，儘管目前經濟改革裁汰冗員的努力尚未積極進行，影響亦未顯現，有朝一日總會成爲問題的。屆時就需更加依賴社會救濟措施。

從所得方面說，一九八八年職工平均月工資二一九·八盧布（一九九〇年九月爲二五七盧布），各業界的薪資和年資都有不同差距。工業部門平均月薪二四〇·八盧布，其中工人二三五盧布，職員二六七·三盧布。建築業平均月薪是所有行業最高的，二八八·九盧布，工

人二八二盧布，職員三〇六·八盧布。當然，運輸業待遇亦不錯，特別是內河運輸平均月薪三二〇盧布。最低的是文化部門，平均月薪祇有一二八·二盧布，保健、體育和社會保障（保險）部門一五二·五盧布。國民教育一七一·四盧布。社會主義國家「工字」當頭，知識分子向來不太值錢；教書匠、醫生的待遇奇差無比。

飲食消費方面，一九八八年蘇聯平均每人一年消費肉類六六公斤，乳類三四〇公升，蛋二七五個，魚類一七·六公斤，糖四六·八公斤，植物油一〇·一公斤，馬鈴薯九九公斤，蔬菜瓜果一〇一公斤，水果漿果五六公斤，麵包製品一三二公斤。蘇聯人民生活方式是西式，因此對肉、乳、蛋的消耗較需切，尤其地處偏北、氣候較寒冷，熱量攝取量大。如果不長得胖胖的，不容易過冬。由於國營商店的食品價格低廉，城市中收入較高的人反而經常有機會和能力購買肉品，造成高收入、高消費、低支出的不平衡現象。

耐久性消費品方面，一九八八年平均每一百個家庭擁有的品類和數量是：鐘表五四六個，收音機九六個，電視機一〇三台（其中彩色電視機三九台），錄音機四六台，照相機三五台，冰箱和冷凍櫃九二台，洗衣機七〇台，吸塵器四四台，小汽車十七輛，摩托車十六輛，腳踏車五八輛，縫紉機六五台。從這種平均數看來，可以發現生活是如何乏味。祇有三分之一家庭有彩色電視機，活在黑白的世界裡，與我們的彩色世界是不能比的。

住的問題十分嚴重。一九八八年蘇聯住宅面積四四億三千四百萬平方公尺，平均每人的面積一四·九平方公尺（約四·五坪），與美國的四〇平方公尺，日本的二六平方公尺相去甚

遠。由國家、合作社和社會組織（如工會）興建的住宅占總面積的六〇%，私人自有住宅占四〇%，按家庭數分配，城市地區每個家庭（平均人數三·三人）的面積祇有五六·五平方公尺（一七坪），鄉村家庭（平均人數三·八人）的面積是六九·五平方公尺（二二坪）。

實際上由國家分配或租予住宅的無殼蝸牛，居住條件甚差，在城市地區職員與工人家庭仍有五·八%的家庭住在共用公寓（即廚房、浴廁數家共用的住宅），有九·六%的家庭住在公共宿舍；另有一·一%住在臨時棚舍和徙置區，等於無屋可住。對於年輕人組成的家庭更難有好的棲身之所，祇有三分之二配得單獨的住所，其餘的需另謀打算，與父母合住或住在公共宿舍。不過，儘管住宅簡陋，看在租金便宜的份上，也就將就一點。一般房租占家庭總支出約四%，每月平均租金十四盧布。

未來住宅政策是希望到公元二千年每個家庭有屋住，而且鼓勵私人興建住宅；發展商品住宅，由國家、社會建造，售與私人。以住宅商品化解決國家投資不足和吸收人民儲蓄（緩和通貨膨脹壓力）。但是對於低收入勞工和青年家庭，仍然是難以承受的負擔。

行的問題並不嚴重，蘇聯的鐵公路、航空設施大體相當方便，而且票價便宜。不過想買個小汽車可不容易，要付出平均工資六十個月的薪水才買得到，而且先付款，後排隊，等上五、六年才領得到車子。

育樂的問題相當純樸。每個鄉村、城鎮都有圖書館、文化宮（活動中心）、俱樂部、戲院、電影院，偏遠地區就由城市文化工作人員下鄉巡迴演出或放映影片。奢侈一點的家中買部錄

放映機、租影帶欣賞。不過嚴格說來，有育無樂。有幾個人會去借書，有多少機會看電影（平均每人一年看十三場電影）。雖說旅遊不稀罕，對中低收入者則大不易。按統計，全蘇人口一年之中約一一%外出旅遊休假（包括重複者，因此實際人數更少）。根據調查，平均每人現金月入七五盧布的家庭，六二%是在家中度假，二六%到親友家度假，到療養勝地、休閒屋度假的祇有四%。但是高收入者外出度假、旅遊的人數和家庭較多。這和窮人過窮日子、捉臭蟲自娛的現象相彷彿。

當然，社會主義社會的穩定性在於它的福利措施和保障。日子過得去，想造反的人就少，特別是資訊不發達，外界消息少，想造反也沒人跟，搞不好不但掉飯碗，還得上山修道。自從戈巴契夫捅了馬蜂窩，要開放、改革，要事事公開不隱瞞，要老百姓自力更生、自行就業創業之後，社會上激起陣陣漣漪，有些地方還搞出大風暴。不過基本的福利還在，問題是隨著通貨膨脹縮水了。

大體說來，國營企業職工與集體農莊農民都被強迫納入社會保險範圍，獲得免費醫療和養老撫恤。學生就學，從小學到大學，免費教育，大專學生還有助學金，津貼生活。對基本消費品銷售，國家採低價政策，補貼生產者，以及低租金住宅配給。

對婦女與家庭問題，規定婦女產前有七〇天、產後五六天的全薪假期，產後至嬰孩一歲半給予部分薪水的育嬰假，一歲半至三歲為留職停薪的假期，藉以鼓勵生育。生產時一次發給三個月最低工資補助金；一年半育嬰假給與最低工資，未就業婦女則折半給與。第二胎以

後，另加發孩童津貼。對單親、低收入家庭的小孩另給補助。三歲以下兒童藥品免費，多子女和低收入家庭免費供應乳品等兒童食品；多子女母親可提早五年退休。多子女家庭優先配給住宅。殘障者給與殘障津貼。

一般而言，一九九〇年的社會救濟和養老月退休金給付的最低標準是：平均每人月收入七五盧布以下的家庭（偏遠地區二百盧布）得到各種相關的補助金和津貼（算是低收入戶）。養老金則按原薪級而有所不同，國營企業職員約按其原薪的五分之二給付，集體農莊農民按其公共勞動原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最低給付額現為七〇盧布。二百萬殘障者，一級殘障月津貼八五盧布，二級殘障七〇盧布。八〇萬名戰爭寡婦（失去供養者）月給六〇盧布。

四、家庭——男人與女人的戰場

家庭，本來是男女共棲的安樂窩、避風港，但有時候也會變成兩性鬥爭的戰場。去年人口普查時，統計全蘇聯共有七千三百多萬個家庭，其中兩人家庭占總數的三一·四%，三人家庭占二五·八%，四人家庭占二四·四%；合計占總人數的八一·六%；這種組合包含三代同堂和單親家庭。

在年齡十六歲以上的男性九千五百多萬人當中，結婚的有六千八百多萬，占成人男性的七二%，鰥夫占二·六%，離婚的占四·七%；年齡十六歲以上的女性一億一千一百多萬人

當中，結婚的有六千八百多萬，占成人女性的六〇·一%，寡婦占一七·四%，離婚的占七·五%。女性離婚人口八百四十八萬多人，比男性離婚人口多出四百零五萬人。

離婚率高是一個嚴重的家庭、社會問題，一九八八年統計，每千人有九·四對登記結婚，同時有三·三對辦理離婚，結離的比例約三比一。離婚與早婚有相對關係，目前年齡廿五歲以下的女性有百分之八十，男性有百分之七十完成初次婚禮。在二十年前女性是七〇%，男性六〇%，當時的結婚與離婚比是九·七對比二·六對。

無論中外，自古皆然；女性的地位經常處於不利和不平等地位。蘇聯男女在鰥寡、離異後十年內，男性再婚者占半數以上，女性祇有四分之一。而且再婚者離異的機會比第一次結婚者高出一倍半。

破碎的家庭，估計全蘇聯有一千五百多萬個，受害最大的往往是子女。據估計，一年有七十多萬名年齡十八歲以下孩童因父母離異而被遺棄。不是由親族（或祖父母）收留，就是被認領和送往育幼院，或者成爲流浪兒；最好的是由原父母送往寄宿學校，供其生活，但不能同居。因此，目前在托兒所（供膳宿）有三十萬名兒童，在育幼院有七十萬兒童寄養著。而且百分之九十五的育幼院孤兒是父母活著的。

離婚率高的原因，首先和女性經濟獨立有關。女性在蘇聯國營經濟體系內就業人數比男性多，在大專求學人數也多於男性。有六〇%的工程人員是女性，三分之二的醫生，七〇%的教師，九〇%以上的圖書館人員，都是女性。女人支撐著蘇聯經濟的半邊天。由於女性既

要上班又要持家，工作分量比男性大得許多。一名女性平均每天（上班日）花費二小時四十四分鐘於家務（包括外出採購五八分鐘），男性祇花五八分鐘於家務。女人一天祇有二小時二十四分鐘自由時間，男性卻有四小時三分鐘。夫婦賺的薪水相差不大，工作量大，不會太愉快的。

家庭居住環境欠佳，住屋狹小、缺乏隱私；對女人或男人而言，不一定舒服。特別是年輕夫婦最難忍受。另一方面，酗酒問題經常破壞家庭。據統計，一九八八年酒類消費平均每人三·七公升（按純酒精計算），若加上私釀酒，共五·五公升（一九八四年共一〇·七公升純酒精）。如果婦女、兒童、老年人不喝酒，按三〇%酒精含量的酒品，估計蘇聯男人每年喝掉九二公升的酒，平均每月喝掉十三瓶（〇·六公升裝瓶量）各類酒品。無怪乎，戈巴契夫要禁酒，禁止上班時間喝酒、禁止喝了酒上班、禁止工廠附近賣酒、禁止在公共場所醉酒。喝酒破壞生產、破壞社會秩序和交通、破壞家庭，更破壞兩性關係。

由於上述原因，也直接影響生育率。蘇聯官方不鼓勵婦女避孕，避孕措施（包括保險套、避孕藥）極為缺乏。在一九八八年婦女墮胎的次數高達六百零六萬八千次（另外，還有一百四十六萬次採取真空吸引術作流產手術）。平均年齡十五—四九歲婦女，每千人有八六·六人墮胎。墮胎多，與性開放有關，更與婦女拒絕生育有關。當然，結果是蘇聯家庭祇有一子的占總家庭數的一半；在俄羅斯，五八%的家庭是獨生子女。

家庭倫理道德的斷喪，苦了身為祖父母的老年人，不少老人親自養育孫子女，也寵壞了他們。而且社會道德也日益敗壞。相形之下，回教地區的保守和高生育率，顯現其宗教的維

護力量。雖然會有不通人情之處，例如烏茲別克的鄉下，有的還保持新婚之夜以白布巾檢驗處女落紅，無落紅即休妻的習俗。但是，宗教信仰至少對社會道德的重振有益無害。要避免家庭淪為戰場，祇有加強婦女福利和改善社會風氣。

五、社會風氣與犯罪——彩色的世界

日光底下無新事，無論從歷史角度或從社會角度觀察。再怎樣封閉的社會，也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即使統治者限制屬民的生活行爲，其本身也照樣表現人性的惡性。像史達林對女人的需求，便成爲民間傳聞。而前列寧格勒第一書記羅曼諾夫，以酗酒出名，常將沙皇的藝術品和用品借來擺飾在他的官邸中，也許是藉以緬懷他的同姓舊沙皇吧。前蘇聯領袖布里茲涅夫喜歡蒐羅外國汽車，他的女婿丘班諾夫則喜歡蒐集鈔票（收受賄賂）。

七〇年代以來，蘇共統治階級的特權和享受是有名的，而且是終身幹部職（除非被逼下台和退休）。蘇共中央委員會有特別醫院，給予高幹最好的醫療服務；有時在特別商店，可以廉價買到各種舶來品；可以看到外界禁演的外國影片；可到黑海濱區度假和別墅居住；甚至享受一般民衆難以享有的出國旅遊。從地方、省市，一直到共和國和中央，領導幹部在各個大小職位上享受賦予的物質生活特權和保障，形成一個官僚統治的特權階級。權力使人腐化，週遭的奉迎阿諛和不斷的進貢，使統治者更爲敗壞和弄權。

對廣大蘇聯人民而言，賺錢和享受生活是同等重要的事。力爭上游者的大學生，打工當家教，替中學生補習是常事，待遇高。當然，非高收入家庭請不起家教老師。集體農莊農民和農場工人則努力經營副業生活。有經營本領的中亞農民，每天大清早運送鮮花搭乘飛機到莫斯科市場銷售，兩蘿筐的花價抵得上來回機票和一大堆日用品。學建築的大專學生利用暑假到西伯利亞承包工程，付出勞力與技術（對方負責提供建材），賺得荷包飽滿。跑單幫、搞副業、兼差幹活是人民爭取更多收入的方式。

享受是必要的。馬列教條早已擱置腦後，黨證（入黨）是爲了求職方便。首先是想辦法住到城市，當然，戶口遷移不易，除非職務調派才能進城。不然就是搞假結婚，總不好讓夫妻異地而居。進了花花都市，自來水、電力、瓦斯等生活供應方便多了。年輕人總喜歡模仿西方世界的的生活方式，穿牛仔褲、跳熱舞、聽搖滾樂或爵士音樂，這是起碼的時髦標誌。談戀愛，公園綠地都無妨，幕天席地另有一番情趣。必要時，借借朋友的房間或外國學生的宿舍，以盡魚水之歡，請他們在外頭喝上兩個小時的北極風。

熱戀成功，辦起婚禮（不算終身大事，離婚的太多了）。先去登記註冊，在人民禮堂由官員證婚。穿白紗或短褲，隨意。回家搞個小酒會慶祝一下，場面無法太大，屋內太狹小；在鄉村則擺個露天舞會和宴會。隆重的，想辦法辦個教堂婚禮。當然，不能忘記隨俗，要到無名英雄紀念碑，獻上一束鮮花，請諸天鬼魂祝福。

有了家庭，攜家帶眷到波羅的海邊或黑海度假是最好的享受，錢是唯一條件。公家給的

旅遊券是方便點，但不代表一切，機會也有限。在海水浴場欣賞漂亮女郎的比基尼泳裝和身材，感到結婚結得太早了。上山露營、外地旅遊也不錯。蘇聯地大風景多，一生也走不完。一次家族旅行，可能花掉一年積蓄；回家後祇好喝羅宋湯（少加點肉），啃大麵包，灌啤酒（伏特加比較貴）。歲月催人老，等著領養老金、吃老本，帶小孩子，坐公園冷板櫈。最後，則住進人民公墓，六塊木板加一塊石碑；人生至此盡頭。

當然，如果不肯按部就班，老實過此平凡一生，也無妨。吃喝嫖賭玩樂的花樣，社會主義祖國照樣不缺；不過得放聰明點，否則進了感化院、人民監獄就玩完了。有了案底，老家（在城市的話）進不了；老爹老娘不讓你（妳）進門，戶口也遷不進來（從監獄轉出，經常被轉到市郊偏遠地區）。人到城裡，成了黑人黑戶（沒有居民證）。像今年缺糧，要靠居民證才准配購糧肉，可就慘了。祇有到黑市買貴貨。住也成問題，除非有自己的私宅，否則真的成爲流浪漢。當然，老婆、孩子（或丈夫）早就飛了。

總之，過去的社會主義樣樣有，就是不夠好、不夠多、不夠精。現在戈巴契夫搞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則是好的、精的都有些，但是缺這少那，不是樣樣有。薪水多了，東西也貴了；活動自由了，遊行、示威、集會、罷工樣樣來了；做官機會有了，特權享受沒了；民族自決了，內戰內亂一起來；交了資本主義朋友、害了社會主義兄弟，東歐兄弟黨垮了。更糟的是，人權有了，罪犯多了，移民多了，公安人員慘了。社會主義價值觀改了，新的價值觀是什麼，誰都不知道。祇看到東正教的上帝出來了。

最後，從犯罪率和犯罪種類、形態不難瞭解今日蘇聯社會風氣的演變。過去，蘇聯當局未曾公布完整的犯罪率資料，有的祇是零星、個別地區的報導。一九八九年元月才決定取消限制，而於同年二月十四日蘇聯內政部有史以來首次公開資料。一九八〇年蘇聯立案的犯罪件數一、五二七、五五七件，一九八五年增為二、〇八三、五〇一件，一九八八年一、八六七、二二三件，一九八九年增至二、四六一、六九二件，一九九〇年前九個月約二百萬件。在一九八六—八七年間，禁酒運動執行可能比較認真，犯罪數量比一九八五年略減。一九八八年開始回增，比一九八七年增加三·八%，一九八九年比一九八八年又增加三一·八%；一九九〇年前三季比去年同期增加一二·三%。一九八九年平均每十萬人有八六六·三件罪案，而俄羅斯、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都超過一千一百件。

一九八九年犯罪案當中，蓄意殺人及未遂案共二一、四六七件，占總數的〇·八七%；蓄意重傷害五一、四八五件，占二·〇九%；強姦及未遂二一、八七三件，占〇·八九%；持械搶劫二二、一七四件，占〇·九%；搶劫一一、六〇〇件，占四·五三%；盜竊國家財物二七五、七八二件，占一一·二%；盜竊私人財物八四五、一五九件，占三四·三三%；詐欺罪二四、九七七件，占一·〇一%；流氓罪一四二、〇〇八件，占五·七七%；盜竊武器和軍用品九五五件，占〇·〇三%；投機罪四五、一四〇件，占一·八三%；貪污罪四、二九二件，占〇·一七%；違反交通安全規則和濫用運輸工具一五一、五七四件，占六·一六%，盜竊麻醉劑八九四件，占〇·〇三%。在這些犯罪中，經濟性犯罪（盜竊國家和私人

財物、詐欺、投機、貪污）占四八·五四%，將近半數。各種犯罪中，增加最快的，當屬持械搶劫，比一九八八年增加七一·七%；搶劫罪增加六六·三%。而盜竊國家和私人財物分別增加六六·九%和五四·一%。

犯罪人數在一九八九年共一、三〇三、九五八人，比一九八八年的一、二八六、五〇五人略增（未逮到的不算）。這些犯人的年齡：一四—一五歲六〇、九七〇人（占人數的四·六七%）；一六一—一七歲一五一、四八七人（占一一·六二%）；一八一—二四歲二八六、一二九人（占二一·九四%）；二五一—二九歲二四七、七九六人（占一九%）；三〇歲以上五五七、五七六人（四二·七六%）。明顯地，青少年犯罪比例相當高，而且在學學生占總人數的一〇·六三%，將近十四萬人。犯罪者學歷，屬於高等教育和中等專科教育者約二十萬七千多人，中等學校者一百零九萬多。

上述統計並非實際犯罪案件數量，蘇聯內政部全蘇科學研究所副主管布凌金（V. Buprykin）表示，有些違法被執法單位隱瞞了（吃案），有的並未報案。例如他們曾對數千名合作社領導人作過問卷調查，結果有三七%的答覆表示曾遭到勒索恐嚇。內政部學院的教授札林斯基（A. Zhalinskii）亦指出，勒索案和經濟犯罪案未實際顯現出來。事實上，像強姦罪，報案的受害人往往祇占實際受害人數的一小部分。而且此種性犯罪的受害人以女學生居多，廣大的年輕婦女（就業婦女）之中受害也不少，但顯然大多沒有報案。

最令蘇聯當局震驚的是犯罪集團（幫派、黑手黨）的興起。內政部對四百個揭發的集團

活動進行研究，這些集團在經濟領域盜竊、勒索，以及搶劫、販毒、包賭包娼等等。集團人數從五人到百多人不等，採取嚴密的組織形態和內部紀律，平均已活動一年半至二年。而且有的與公職人員掛鉤，收買賄賂之。有的集團擁有槍械、汽車和無線電通信器材，以及催淚瓦斯和火箭砲與警犬。其裝備比警察人員還要好。被發現的幫派、集團據估計祇占所有犯罪集團的五——一〇%。在一九八六——八八年揭露的集團共二、六〇七個，犯案約二萬件。

持械犯罪的比例大增，一九八九年有五千五百件持手槍（槍械）犯罪，包括三百件攻擊警察人員。在民族衝突事件中，警方（和軍方）失竊數千支槍砲，包括一五〇支高射砲和火箭砲。蘇聯「共青團真理報」記者曾在黑市問過由自製手槍至機關槍的價錢，並且買了三支手榴彈發射器，也拒絕了賣家一萬美元賣一輛坦克的建議。槍械氾濫，所造成的犯罪機率自然大增，殺傷力也大（刀械落伍了）。

賣淫業的發達不在話下，娼妓從地下酒吧、軍營發展到大學校園、觀光飯店。每日在莫斯科以外國遊客為對象的「專職妓女」至少一千二百名，兼職的更難估計。而以本國同胞為客戶的，恐怕成軍成團。當然，莫斯科小政黨「自由意志黨」公開主張娼妓合法化，因為她們經常面對暴力的威脅，被迫賄賂警員和酒店侍應。有妓女，不免有「妓男」。莫斯科今春出現「出租丈夫」的廣告招貼，一晚的代價一百盧布；據負責連絡的婦人說，生意不錯。

酗酒雖非刑事罪，卻與之關係密切。四分之三的殺人犯是在酒醉情況下行凶，而且刑事犯當中，酒齡相當早，多半在十六歲之前學會喝酒。莫斯科市警方亦表示，七〇%的殺人和

八〇%的重傷害是在醉酒情形下發生的。一九八九年市警方在街道上「收集」了六萬二千名酒鬼，一萬四千名在公共場所喝酒被拘留。全國的酒鬼總數可想而知，十分龐大了。

吸毒雖非新興罪行，但近年有蔓延趨勢，道友增多且愈益年輕。據估計，吸毒道友人數超過五萬名；在自阿富汗撤軍後，中亞地區的植物性毒品種植突然增加，其中必有關連，大概是供應回國的從軍毒友吧。

交通事故死亡者在一九八九年達五八、六五一人，受傷者三四七、四〇二人，比一九八八年分別增加二四·三%和一六·七%。同年，火災死亡者九、一〇四人，財物損失四億五千五百七十萬盧布。

總之，犯罪率激增，半因貪財，半因好勇鬥狠；犯案者知識程度不底，傾向組織性犯罪；或許和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思想有關，較易集結成群。例如，一九八七年六月，黑龍江對岸的共青城即發生一百多名青年攻擊警察局救同伴的事件，緣於三名同伴在舞會時打架滋事。這種動不動就是一群人集結鬧事的例子不少，特別是在種族衝突時更明顯。即使是強姦犯，也喜歡一起來，四分之一的案例就屬於輪姦性質。無論如何，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顯係亦衝激社會治安問題，一方面是舊法不再適用（如，禁止對非法居留的黑人和寄生分子實施勞動改造），新法未立，司法界窮於民刑法的修訂、整理。二是執法人員難以有效應用公權力。三是經濟困境造成大量的經濟性犯罪，黑市猖獗到公職人員也跟著下海。四是種族衝突、暴亂，造成大量軍用武器流落不法分子手中。五是高壓統治不再，一些流氓或不事生產者容

易變質為犯罪來源。最後，犯罪者以青少年占高比例。顯然，家庭與教育有了問題。